

王晓朝
◎
著

传统道德向 现代道德的转型

在中国学术史上，能够称得上“新”的时代不多，最近一次的新时代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上半叶。这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和苦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思想创造和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性的激烈碰撞中，不但在文史和哲学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产生了辉煌夺目的思想和群星灿烂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百家媲美的时代，如果这一时代也如先秦时代那样持续几百年，中国学者也可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可与西方强势文化相匹配的中国现代文化。但历史不容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这一学术新时代结束得太早了。

丛书主编 / 赵敦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道

德

与

哲

学

新

列

传统道德向 现代道德 的转型

王晓朝◎著

B82
W14

B82

W1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王晓朝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2
(道德与哲学新论系列)
ISBN 7-207-06141-2

I. 传... II. 王... III. 道德—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852 号

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

Chuantong Daode Xiang Xiandai Daode De Zhuanxing

王晓朝 著

出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字数/340 000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书号/ISBN 7-207-06141-2

1 号楼

/B·192

邮编/150008

印刷/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网址/WWW.longpress.com E-mail

印张/14¹²/₁₆

hljmcbs@yeah.net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徐 冲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整体设计/于克广

印数/1-4 000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定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作 / 者 / 近 / 照

作者简介

z u o z h e j i a n j i e

王晓朝，1953年6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杭州大学哲学本科毕业，1984年杭州大学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6年英国利兹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84年至1998年在杭州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9月至2000年4月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2000年5月至今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2001年8月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10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全国宗教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哲学与宗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哲学、早期基督教哲学、基督教文化、现当代宗教哲学、现当代文化哲学、宗教伦理学、中西文化交流史。已出版《裂变の烦恼：当代西方哲学精华》（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希腊宗教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柏拉图全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2002—2003）等10余部著作，论文80余篇。

道德与哲学新论系列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任

陈春江

副主任

李久军

委员

龚江红	李文方	刘福文
高翠华	柴力明	刘海滨
陈 愚	徐 冲	

总序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面临着文化转型和道德建设的艰巨任务,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神圣与世俗、科学与人生、价值与事实、个人与社会、人权与主权、公正与效益等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重要问题。哲学作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结晶,要对这些重大问题做深层次的思考,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承担哲学的时代重任,我特邀几个学友发表他们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心得。他们多年来一直关心中国社会的道德和文化问题,他们严肃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次通过“文丛”方式,结集出版他们的理论观点,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反响。本“文丛”包括五本专著:卓新平所著的《神圣与世俗之间——关于宗教、人生、伦理的断想》,邓晓芒所著的《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王晓朝所著的《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何怀宏所著的《良心与正义的探求》,以及我本人写的《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

我们这些著作之所以冠名为“新论”,是为了表明我们迎接中国学术新时代早日来临的迫切愿望,以及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

贡献的努力。在中国学术史上,能够称得上“新”的时代不多,最近一次的新时代发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叶。这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和苦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思想创造和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性的激烈碰撞中,不但在文史和哲学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产生了辉煌夺目的思想和群星灿烂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百家媲美的时代,如果这一时代也如先秦时代那样持续几百年,中国学者也可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可与西方强势文化相匹配的中国现代文化。但历史不容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这一学术新时代结束得太早了。

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中国思想对外开放的产物,是把西方的和俄国的革命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创举。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却把这一创举当成终结性的胜利,把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理论绝对化为真理的顶峰,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代替全民族的文化建设,用政治性的批判代替学术争鸣,走上了闭关锁国之路,最后在“批判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完成了全面排斥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思想封闭,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劫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大门,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流派再次涌进中国,中国传统思想也得以复兴,获得发扬光大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了学术的春天,知识分子在思想园地里勤奋耕耘,满怀着丰收的希望。记得在 20 多年前,看到一位青年作者写道,原来把写书看得很神圣,后来有了丰富的写作经验,觉得写书和小时候看到的种庄稼过程没有什么不同,春天把种子播撒下去,秋天就可以一箩一箩地收庄稼了。这位作者的表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文风,这就是,用种庄稼的方式做学

问。其结果是,我国现在的学术出版物以不亚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大概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指标。但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有国际影响的,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更是微乎其微。

人们翘首期待的学术新时代并没有到来。有人以“时机未到”的借口聊以自慰,他们会说,中国迟早会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人们不禁要问,即使若干年后,中国真的出了一个或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与世界上的文化大国和思想大国的成千上万的思想家(他们之中只有几百个能够有幸获得诺贝尔奖)相比,又能在几多程度上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我们期待的不是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一个学术上的新时代。俗话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思想上的英雄创造新时代,新时代又为思想英雄的涌现开辟了道路。只有在能够创造大量的思想英雄的新时代,获得诺贝尔奖才不是一件望眼欲穿的渴求,而是瓜熟蒂落的平常事。

学术的新时代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降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但 21 世纪与 20 世纪在时间上的差别不过是地球绕太阳多转了几圈而已,那些认为进入了新世纪就是进入了新时代的说法不过是盲目乐观而已。说实在的,我对目前的学术环境并不乐观。我们现在所处的学术环境(注意:以下要比较的是学术环境,而不是社会环境),固然不能与 20 世纪初期那个学术的新时代相比;即便与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环境相比,也有退步的表现。

人们现在经常把不良的学术环境归咎为学术制度和管理制度上的弊端,如评职称制度,科研成果的量化指标,评奖、评项目、评学位点和其他种种评审、评比制度,等等。制度上的弊端固然不能否认,但我们要记住:制度由人制定,靠人来执行。学术制度上的

弊端是人的封闭的、狭隘的心态的反映,这些弊端之所以迟迟不能纠正,也是因为它们程度不同地适应了学术群体的心态。虽然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开放,但我们的学术群体的心态却在退步,变得封闭起来,不如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开放,也不比思想解放时的社会心态开放。这种封闭的心态是难以归咎于制度上的弊端,倒是需要在我们自身找原因。我在这里谈到的封闭的学术心态,有两种突出的表现:一是“中国思想特殊”论,一是“学科专业中心”论。以下分别予以检讨。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念,中国人传统是特殊的,文化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是特殊的。据说,中国人的特殊性历史漫长,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甚至上百万年的“蓝田人”、“元谋人”起,就有了特殊的中国人种和文化。“中国特殊性”的现代性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政治路线,不能把它庸俗化,动辄以“中国特色”相标榜。如果中国学者以“中国特色的理论”为研究方向和目标,那就等于放弃了理论的普遍性标准。不要以为“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是普遍真理。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的特质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二是认为一个民族能够贡献出普世的普遍理论。前一种理解往往满足了西方民族对其他民族风俗人情的猎奇心理,在文学艺术等领域有一定的市场;后一种理解把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普遍的理论结合起来,更符合科学、哲学和社会、人文理论的发展要求。后一种理解的一个范例是犹太思想。犹太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在失去祖国的近二千年历史中,他们流落在异国他乡而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但民族传统并没有成为创立普遍理论的障碍。身为犹太人的思想家从不以“犹太特色”为理论目标,而是世代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样,人类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今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中国学者更没有理由把“中国特色”作为理论创新的目标,更没有理由强调“中国思想特殊”而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争论和批评,拒绝与国际学术标准接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甚至进而认为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思想的研究必然是世界一流的,外国人要懂得这些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的学说就必须先学习中文,而我们中国人则没有必要从外国人那里学习他们的(“二流的”)汉学研究成果。这些“中国思想特殊”论把理论研究封闭在狭隘的地域观念之中,降低了学术标准和目标,滋长了井底观天、固步自封的狭隘心态,对于理论的发展和 innovation 有百弊而无一利。

现在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叫做“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听起来这是一个重视学术的主张,但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着强化不合理的学科划分和阻碍跨学科研究、违反学术发展趋势的暗流。

现在所说的“学科建设”的单位,主要指二级学科的学位点。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划分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以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为例,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和宗教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这可奇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算西方哲学(难道它能够与西方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分开?),也不算中国哲学(难道它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成分?);中国哲学可以与伦理学和美学分家;与中国传统哲学接近的韩国和日本的传统哲学(其典籍就是用汉字写的)算作外国哲学;而外国哲学中的西方哲学也可以和伦理学、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分家;科学技术哲学可以与自然科学史(那是另外一个“一级学科”)分家;宗教学属于哲学,而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分家;逻辑学属于哲学,而与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分家。学科分类目录是学术地图,用这

样一张糊涂的地图来指路,不知要把“学科建设”引向何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这些划分不合理的“二级学科”为“中心”来做学术,不要说跨学科研究了,连原本是综合统一的哲学理论也被人为制造的隔阂障碍弄得支离破碎,以邻为壑。

跨学科研究是当今世界的学术发展趋势。据北京大学科研部的一项资料,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和基本理论的创新成果,几乎没有一项是在传统的“一级学科”(如数、理、化、生、地)的范围内取得的,都是打破学科界限,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而取得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是这样。比如,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等),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各种学科相交叉的“分支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考古哲学、生物哲学),还有跨哲学(P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的综合学科 PPE,等等,都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理论形态。

在自然科学和高科技领域,以追赶国际最新成果的科研项目为指导和 SCI、ECI 等国际指标为标准,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基本适应了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传统的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所有科研项目是“中国特色”的,论文的语言、内容和质量是不能与国际接轨的,因此不需要、也不能够用 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和 AHCI(艺术和人文学科论文索引)等国际指标来衡量。没有适应跨学科研究这一学术新趋势的需要和压力,文科的“学科建设”的自我封闭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违反了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学术上的衰落在所难免,封闭和衰落造成的学术腐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其根子就在这里。

正因为理想显得那样遥远,我们更有责任朝向理想做不懈的

努力；正因为身处的学术环境令人堪忧，我们更要有兴利除弊、革故鼎新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沿着跨学科研究的方向，推动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改进我们的学术环境。我的几个学友，都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他们都受过西学的严格训练，同时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既是本学科的专家，同时也广泛涉猎其他学科领域。卓新平曾在海外专攻基督教神学，回国后，对宗教学的各个领域和各个主要宗教，以及宗教伦理和人生哲学，都有全面的研究。邓晓芒是研究德国哲学的专家，同时在美学、文学评论、道德哲学，以及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王晓朝是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同时对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伦理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进行专门研究。何怀宏曾是专攻西方伦理学史的博士，后来的研究扩展到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领域。至于我本人，也在做跨学科研究的努力，虽然常被人称为专家，但我自知只是思想世界中的一个漂泊者而已。

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重大，但也有同样重大的风险，一个人不可能精通各行各业，在自己专攻的本行之外，很难不说一些“外行”话。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研究是各相关学科专家们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我们以跨学科研究心得与各学科的专家切磋；有些读者虽不是专家，但与我们同样关心中国现代文化和道德建设问题，我们也引以为同道。我们怀着与同道们对话交流的心情，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们的批评和回应。

赵敦华

2003年10月于北京大学

导论 文化转型与道德重构

从1978年至今,在短短的25年、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大大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中国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民族的生存危机,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这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现阶段走向的一个基本共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身处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我们的荣幸,值得我们为之殚精竭虑!

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与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这是许多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在20世纪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显得极为渺茫!然而,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多年的封闭,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复兴

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诚如中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清华哲学的奠基人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了，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旧的结合新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是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①

“旧邦新命”，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古老的中国文化正在转型与重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只有敢于并且善于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成果，不断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保持蓬勃生机。如果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拒绝与其他文化交流，拒绝接受外来的有益的东西，结果只能是走向停滞和落后。我们要学习冯友兰先生“旧邦新命”的伟大抱负，本着中西对话、中西互释、中西互补、中西融通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更新奉献力量。

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又变动不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价值与道德易于维系与保存，因此社会的道德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而在一个开放而又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传统价值的衰落和道德危机的出现则是不可避免的。像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化处于转型时期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产生了道德危机。应该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新道德？这是我们在 20 世纪并未真正解决的一道世纪难题。

面对道德危机，我们不应把产生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改革开放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明志”，第 354 页，人民出版社，1998。

本身,而应在关注这种危机的同时努力重构新时期的道德。因为,“现代化社会改革本身是一场通过社会基本结构的调整 and 改变,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效利用,从而创造更有效更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运作形式的现代理性化实践运动。它自身不仅需要理性与秩序的支持,也需要适应这一社会转型要求的新型道德资源和社会伦理秩序的配合与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近 20 年来的现代化社会改革,根本上是有利于新型的道德观念生长和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①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和民众对公民道德建设越来越重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仅已经被真正纳入了整个社会行动的规划设计,而且也日益受到全社会公民的重视。经过学术界、思想界多年来的呼吁,中国民众已经懂得,培育必要的伦理秩序和个人美德已经成为我们能否真正进入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资格,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社会伦理的重构和个人道德的调整。

文化转型与道德重构是本书的主题,跨文化的比较则是本书的基本方法。“一个人惟有出入于不同历史文化的探究中,才能够跳出自身存在的褊狭限制,目光烛照千古,为自己的生命立心,也为世界的未来找得一条坦荡的大路。”^②笔者试图在中外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探讨文化转型的理论,并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碰撞过程中,说明当代道德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然而,志大才疏、学力不逮,这一目标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非已经完成的工作。

纳入本书第一编“视域与方法”的 7 篇文字带有方法论的性质,集中反映了我的文化观,以及我对学术界相关研究动态的把握;纳入本书第二编“破解西方文化基因”的六篇文字展示了我对

^①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第 391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② 刘述先:《文化哲学》,第 188 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西方文化源头和本质的理解,它们虽然属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范畴,但我的文化理论中的规律性总结却来自这些探索;纳入本书第三编“道德、宗教与文化”的八篇文章涉及道德、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包含着我对西方文化的支柱——基督教精神——的一些理解,既有对古代基督教思想的探索,又有对现代基督教思想的把握;纳入本书第四编“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六篇文章重在分析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关系,力图清理以往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一些误解,推动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与融合;纳入本书第五编“走向全球伦理”的五篇文章是我在参加有关“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一些学术会议时发表的个人意见,与以上各编的内容一样,它们都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体系化、系统化了的定见。上述文字绝大部分曾经公开发表,在汇辑成书时,除了文中小标题有少量调整外,注释均保持原样。